

# 从0到1,怒江大峡谷的娃娃有了标准足球场

新华社昆明6月15日电(记者岳冉冉、赵珮然)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们踢球前,得互问一句:“会游泳不?”因为,足球很容易被踢进怒江,得下江去捞。

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一个现实——在怒江,真的很难找到一块适合踢足球的平地,更别说一块标准足球场了。

怒江州属于我国最贫困的“三区三州”范围,98%的土地面积是高山峡谷。从卫星上看,巍峨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绵延数百里,怒江从中奔流而过。江畔的村寨多建在半山腰,周边都是高山悬崖,九成土地为25度以上的坡耕地,耕种困难。

一方水土都难养活一方人,怎么可能让下一代踢球?再加上没场地、没器材、没教练,足球怎么可能在娃娃中普及?

直到2016年,一切开始悄然发生改变。

那一年,怒江州与珠海市签订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珠海很快派出了工作队前往怒江。2017年9月,作为珠海援建泸水市大兴地镇维拉坝易地扶贫安置点的配套工程,“格力小学”开工建设。一年后,学校竣工。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珠海人竟利用地势极限,为这所小学建了一块标准的五人制足球场,而且是天然草。

话分两头。彼时身在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的教师谢春平,正在默默关注怒江的消息。看到那里的孩子连上学都要走十多公里山路时,她的内心极其震撼,随后决定申请到怒江支教。

到了怒江,谢春平惊讶地发现,生活在大峡谷的小孩几乎没见过足球,哪怕是拥有足球场的格力小学,也没一个孩子踢球,草坪就这样被荒废着。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谢春平脑海里萌生——一定要让足球走进怒江的小学,让娃娃们踢上足球。

凭借校友关系,谢春平找到了广东华南虎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刘水,请他帮忙。刘水当即拍板,一定派出职业足球教练支援怒江。

2019年9月8日,珠海、怒江、“华南虎”三方签订了《足球支教训练计划》:华南虎派出专业的青训教练常驻学校,帮助格力小学开展足球日常教学、运动队建设、联赛组织、足球嘉年华等工作。同时,俱乐部联合珠海湾仔小学、相关体育用品公司,定期向格力小学提供足球教学、训练装备及技术支持。

有了场地、教练、装备、器材,怒江娃娃踢球已是“万事俱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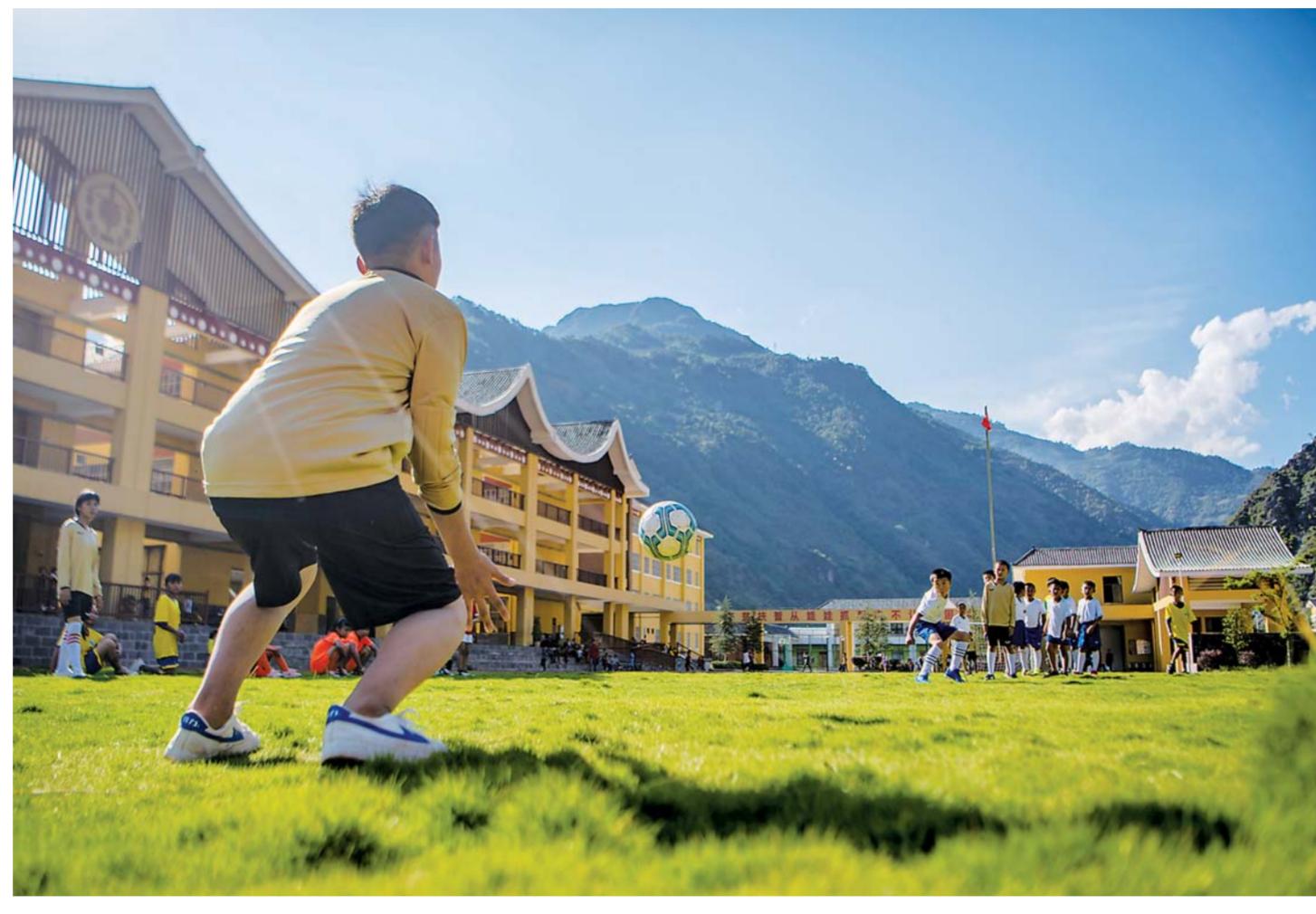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这句话在格力小学校长吴金凤嘴里,却变成了:“哪有什么实现不了,只是有人为你创造条件。”

“我打心底里感谢这些好心人,是他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傈僳族小孩认识了足球,爱上了足球。”吴校长感慨。

足球帮扶进校园,成了珠海助力怒江脱贫的创新之举。很快,格力小学男女足球队成立。有亚足联教练员证书的刘志强成了该校首位专职足球教师。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是“高配”。刘志强在怒江一待就是五个月,硬是把这帮傈僳族小孩的足球技术、体育老师的教学水平“调教”得有模有样。直到今年寒假,他才第一次回家。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刘



▲这是5月18日拍摄的“格力小学”的孩子们在球场上训练。



▲这是位于怒江边的泸水市大兴地镇维拉坝易地扶贫安置点内的“格力小学”足球场。(5月18日摄,无人机航拍照片)



▲这是5月18日拍摄的“格力小学”的孩子们在球场上训练。

本组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志强所有计划,再加之华南虎俱乐部遭遇危机,刘教练没能在5月开学时重返校园。电话那头,他告诉记者,怒江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尤其耐力出色,只是不少孩子身体单薄,如果营养跟上,进步能更快。“只要好好培养,女队中能出几个好苗。”

即便不能现场教学,刘志强仍心系怒江,他会把足球课视频发给体育老师,询问“尖子生”情况。“毕竟教了快半年,有感情,等我把手头事处理完,就回怒江看他们。”刘志强说。

如今,格力小学足球课的名声越来越

大,很多家长慕名把孩子送去,哪怕要多走几公里山路。五年级的雷华苗就是其中的转学生,也是队中唯一一个知道球星的小孩。

“我喜欢C罗,想进国家队!”雷华苗比了一个C罗进球后的标志动作,怒吼一声。

周五下午是格力小学的校队比赛日。骄阳当空,绿草茵茵,晒得黝黑的傈僳族孩子在球场上自由奔跑,笑容灿烂。

只学不到半年的足球,就能踢成这样?记者惊叹于他们的进球和过人技术,赶紧用

随身携带的所有摄影器材——相机、GoPro、无人机、360度全景相机记录下了比赛过程,希望能把这场大山深处的足球赛剪辑成小片,当作礼物送给孩子。

那天,谢春平也坐在场边。她说自己已经申请延长了支教时间,希望能继续牵线搭桥,让更多关心中国足球的人,能来这里帮助山里娃。

许多年后,在中国的职业足坛或业余赛场,我们真的能见到傈僳族孩子的身影,听到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来自怒江!”

# 长江“禁渔”近半年,偷捕现象仍未绝

非法电捕、组织化偷捕、渔政力量不足……“江鲜”还在高价交易

倍,供不应求。清明前的长江刀鱼刺很软,一公斤甚至能卖到6000元左右。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在长江捕食野生刀鱼屡禁不绝。记者在多个发生交易的市场上没有看到监管人员。“他们来我们就躲,他们走了我们卖。”有商户称之为“躲猫猫”。

某市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曾联合开展长江水产品专项执法行动,工作人员透露:“执法中发现,私下里还是有偷偷摸摸点对点的销售,在一些餐馆发现有长江水产品。”

除了刀鱼,长江里白鱀豚、白鲟、长江鲥鱼等物种也已多年鲜见,中华鲟、长江鲟、长江豚等极度濒危。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保护岌岌可危的长江生物资源。但记者发现,“禁渔令”下,一些人还继续在珍稀物种保护区偷捕。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近期破获一起案件,3名犯罪嫌疑人在凌晨驾驶小渔船开到江豚保护区,使用自制的电抄网捕鱼,短短3个多小时就捕捞150多公斤的渔获物。

**非法电捕是主要方式,偷捕和销售呈组织化、专业化**

电鱼是偷捕的主要方式。“这是标准的酷捕滥捞、竭泽而渔。过去,渔民都知道要让水域休养生息,但现在,即便是长江禁渔以后,也仍看到不少人非法电鱼,让人愤怒、痛心。”多年从事长江水生物保护的志愿者张明浩说。

“长江禁渔后,受暴利驱动,一些原先并

非渔民的人也加入偷捕。”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曹钦说,这些人主观恶意大,反侦查能力强,呈现组织化、专业化特点。

“他们了解警方打击偷捕需要查获鱼和渔具等证据,于是故意将捕获的鱼藏在一个地方,将渔具藏在另一个地方。”曹钦说,“而且,他们与渔民不一样,不是个人或夫妻俩,通常是一个团伙协同犯罪。”

据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三级调研员岳才俊介绍,长江禁渔以来,渔政部门已组织开展4次省级长江渔政专项执法行动,收缴违法违规捕捞网具近1000套,没收渔获物120公斤,查处非法捕捞案件58起。

岳才俊说,从查获的较大非法捕捞案件看,非法捕鱼团伙常常使用便携式电鱼设备,快艇分工协作,机动灵活,遇到查处经常会把作案工具直接丢入江中销毁罪证,导致执法取证难度大。

据警方和渔政部门反映,长江渔业资源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鱼需要当天处理,凌晨就被运到各大饭店或水产市场,利益相关者都是共谋。”

此外,为逃避监管,不少偷捕人员选择夜里作案。扬州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所长王明超说,黑灯瞎火,船只容易发生碰撞,江上执法危险性大。而偷捕人员软暴力抗法现象也十分常见,甚至以跳江、自残等手段相威胁。

有关人士认为,长江生态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对捕捞、运输、销售、餐饮等多环节进行监管。

记者还发现,一些渔民因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上岸定居后就业率不高。“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渔民真上岸,才有人与水的真正和谐。”长江淡水豚保护专家章贤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转型。

57岁的藏族牧民格桑有套“山景房”。天气好时,从他家门里向外看,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山尖正好能被框在门洞里,仿佛是他家墙上的一幅木框画。

“珠峰?那个就是。”格桑指给记者看,然后继续低头算他们村去年的收入,他是村委会的成员。

“我登上过去啊。”他补了一句。

**珠峰脚下的传说**

登顶过珠峰的格桑,家住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藏普村。这是中国境内离珠峰最近的行政村之一,平均海拔5000米。格桑在这块高高的牧场上生活了几十年。

一个从未受过相关训练的牧民登顶珠峰,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传说。

“听说过,没见过,真有这么个人?”西藏登山协会的联络官索朗有些惊讶。据他介绍,从中国一侧的北坡申请攀登珠峰需满足多项资质要求。申请者要由专业向导带领,并至少登顶过一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雪山。

“珠峰北坡,目前肯定不会对格桑这样资质的人开放的。”索朗说。

但格桑的珠峰登顶证书上确实清楚地写着,他于2001年成功登顶。

彼时,珠峰攀登已进入商业登山时代,但运行模式与今日大为不同:日后成为国内高海拔登山向导摇篮的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原西藏登山学校)刚成立两年多,中国本土的向导队伍和登山管理新模式都尚未成熟,北坡向导工作还完全由国外公司占据着。

格桑说,他就是跟着一位名叫罗塞尔的外国人的团队登顶的。

**“真不该上来!”**

1996到2007年间,新西兰人罗塞尔每年都在珠峰北坡组织商业攀登。西藏最早一批商业向导中,很多人都曾在其团队实习过。

1997年,格桑也开始像许多同乡一样,赶着自家牦牛在珠峰运物资,并服务于罗塞尔团队。2001年,公司临时需要一个登顶背夫,格桑被选中了。

“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好吧。”格桑说,运物资一般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普通登山者两天才能走完,他只要五六个小时。海拔6500米以上开始有冰雪路段,藏族向导就教他怎么穿冰爪行走,他也很快学会了。

至此,格桑觉得骄傲又自信,还没有普通村民获得过登顶的机会。

可冲顶开始后,他后悔了。

“7000多米后风变得很大,站都站不住。”格桑说,冲顶那天经过海拔约8600米的“第二台阶”,有个外国客户甚至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吓得尿了裤子。

“我也腿软,抓着绳子不敢往下看。”格桑说,自己当时一直在想老婆和孩子,觉得“真不该上来”。

好在,黎明后,格桑登顶了。站在峰顶,他看到“脚下的云是平的,很宽很宽”。他当时特别高兴,这更多是因为“可以回家了”。

**十年珠峰,十年牧场**

村里有人觉得格桑厉害,也有人说他疯了。第二年,他依旧去珠峰工作。人们知道他登过顶,但喜马拉雅山区从来不缺从农牧民迅速成长为登山好手的传奇,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早已声名在外,格桑也就没能成为什么明星。

他在罗塞尔团队里干了十年。2008年,罗塞尔转战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

也是那一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成功在珠峰峰顶传递,通过保障火炬登顶,中国西藏的向导们为建立自己的商业攀登模式练了兵。再之后,他们接管了珠峰海拔6500米以上每年的路绳铺设任务,标志着其技术能力已赢得了各国际团队的信任,并逐渐成为了北坡登山的主导者。

而随着登山管理日趋严格,普通村民最多只能被允许上到海拔6500米的高度运输物资、清理垃圾,以更安全的方式获得收入。

格桑的经历,便成了中国珠峰登山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绝唱。

2008年后,格桑又做回了牧民,几乎一年到头住在牧场。2018年,他当选村委会成员,才有更多时间留在村里。每年四五月份,乡里仍会出牦牛帮登山队运物资赚钱,他把这个机会给了儿子。

直到今年,配合珠峰高程测量进行的5G建设需要临时工,格桑才再次重返珠峰。

“身体不行了,山上不怎么去了。”格桑说,小儿子后来上过西藏登山学校,他有些羡慕,但也说:“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活法,现在这样挺好的。”

**攀登的意义**

几乎每个登顶珠峰的人都会被追问攀登的意义。

“登顶了很开心,证明我身体好。”反复问格桑,他总是这个答案。

为什么登山?这个登山界的终极一问,很难说格桑是没有仔细想过,还是想得简单又明白。

“有些人是想出名吧。我就是好奇,想上去看看。”他说,“现在已经看过了。”

最后,记者想看看格桑在珠峰峰顶的照片,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能搬家时弄丢了。”他笑笑,转身从屋里拿出一套连体羽绒服,说这是登顶那年,罗塞尔团队发给他的。

“一直保存着,是留个纪念吗?”记者问。

“算是吧,而且这衣服暖和,冬天牧场上风大,穿起来正合适。”格桑说。

(记者王沁鸥、侯捷、孙非)新华社拉萨6月15日电



▲这是格桑站在自家院子里,远处的背景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孙非摄